

变迁社会的社会安全感测量

——基于北京、东莞、阜阳三市的调查分析

李雪¹，万惠仪²

(1.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摘要: 社会安全感是公众对社会安全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 是公众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活中对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保护程度的综合心态反应, 也表示公众对社会治安状况的认知, 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水平。根据这一界定笔者构建出测度社会安全感的指标体系, 并在北京、东莞、阜阳三市的调查中加以应用。针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 本指标体系能够有效、准确地描述上述三市的社会安全感水平, 具有较高的效度;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是影响社会安全感水平的重要因素; 某个群体的社会地位越高, 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 相对易损性越低, 社会安全感水平越高。

关键词: 社会安全感; 指标体系; 德尔斐法; 社会地位; 相对易损性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经历了并且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在这一过程中,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市场调节开始取代国家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社会成员不得不面对社会变迁带来的巨大挑战和压力。在此背景下, 公众对于社会的不确定感增强, 社会安全感水平有下降的趋势。

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安全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人的基本需求^[1]。在大部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基本生理需求已经满足的今天, 安全需求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因此, 社会安全感不仅是衡量一个社会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而且还是承受着剧烈变迁冲击的人们的迫切需求。

然而,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安全感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并未明确它的内涵和外延, 也未设置出一套系统的测度指标^[2]。零点调查公司曾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安全感进行了调查^[3], 但该调查并未精确划分安全感的等级, 仅将其粗略分为“比较安全”、“非常安全”等, 而且也没有公布它的测量方法。为推动和深化社会安全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准确地界定和测度社会安全感便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试图在此方面进行初步探索。

一、社会安全感的界定

一些研究者认为, 社会安全即社会治安, 社会安全感主要指人们对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与感受^[4]。笔者认为, 社会安全感是个综合性的概念, 社会治安只是其中的一方面。

在对“安全感”的界定方面, 时蓉华曾指出: 安全感(feeling of security)是“个体在其安全需要得以满足时内心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个人在社会生活中, 自然会产生对于前途、安全、保障自身地位等需要, 而安全感是这种需要得到满足时, 个体所做的反馈形式。……值得指出的是, 安全感只是一种主观情绪体验, 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变异性, 而且同一客体的感受程度也因人而异”^[5]。可见, 时蓉华认为安全感是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 等同于个体

安全感。朱智贤则认为“安全感指人在摆脱危险情境或受到保护时所体验到的情感”，“对维持个体与社会生存是不可缺少的”^[6]，他虽然仍认为安全感侧重指个体感受，但也承认安全感有助于维持“社会生存”，即安全感也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综合感受。在此意义上的安全感可称为“社会安全感”。

笔者认为，“安全感”是“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的总称，“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分别表征“安全感”的两个方面。人们对“社会安全感”的定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它是一种主观感受，而非客观实体；第二，它感受的主体应是称作为“公众”的一定范围内的居民群体，而不是某一居民个体^[7]。它既是民众个人安全感的总体反映，也直接影响民众个人的安全感发展^[8]。

基于此，笔者把社会安全感的概念界定为：它是公众对社会安全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公众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活中对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保护程度的综合心态反应，也表示公众对社会治安状况的认知，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水平。虽然它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变异性，但由于它是对一定时期内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同时，和个体安全感的易变性不同，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安全感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些都构成了测量的前提。

社会危机感是和社会安全感相对立的概念范畴。社会中如果安全感较高，危机感则较低；反之，危机感则较高。但安全感并非越高越好。对个人来说，过高的安全感会削弱人的竞争意识，不利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妨碍个人的自我实现；同样的，社会安全感过高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过高的社会安全感可能出现在两种类型的社会中：一是像我国计划经济时代那样，通过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人为缩小社会差别，这种由平均主义带来的高安全感销蚀了人们的进取心，不利于生产者潜力的发挥，导致社会生产停滞不前，整个社会失去了生机与活力；二是像北欧的福利国家那样，完善而优厚的社会保障政策使个人无须劳动也能过着不错的生活，人的进取精神大大减弱，社会活力不足，社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总之，适度的危机感和良性的安全感相配合，才能在社会中营造既友善又积极的氛围，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二、测度社会安全感的指标体系

为了准确衡量社会安全感的水平，笔者根据上文对社会安全感概念的界定，通过操作化将其转化为可以观察和辨认的具体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 5 个二级指标和 13 个三级指标（见表 1）。

人的安全需求包括希求保护与免于威胁从而获得安全感的两方面的需求^[9]。笔者认为，人的安全感的获得主要来源于对自己希求保护与免于威胁的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对个人来说，希求保护与免于威胁的需求主要包括较好的个人生活状况、对个人风险的清醒认识及完备对策、与他人交往的稳定而信任的心理状况、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对社会形势及社会前景的稳定和充满希望的评价。围绕上述五个方面，我们设计了相应的五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中结合一些典型场景设计更具操作性的三级指标。

“个人生活状况的评价”主要指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水平的认知和评估，它对个人总体的安全感影响较大，包含的内容也较丰富，包括“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评价”、“对个人生活的评价和预期”、“对家庭收入状况的评价及预期”以及“对自己社会地位的定位”四方面。

“个人风险的认知和评估”指个人对自己遭遇风险的可能性、应对能力的高低的认识，它包括两个三级指标，即“对保险的认同程度”和“对突发风险的担忧”。这里的保险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一般来说，对保险认同程度较高、对突发风险认识较充分的人心理更为稳定成熟，安全感水平也更高。

表 1：社会安全感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社会 安 全 感	1. 个人生活状况的评价	(1) 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评价
		(2) 对个人生活的评价和预期
		(3) 对家庭收入状况的评价及预期
		(4) 对自己社会地位的定位
	2. 个人风险的认知和评估	(5) 对保险的认同程度
		(6) 对突发风险的担忧
	3. 社会交往的个人取向	(7) 对陌生人的信任
		(8) 助人意愿
	4. 社会治安状况的感受	(9) 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总体认识
		(10) 公共场所的行为选择
		(11) 夜间行走的限度
	5. 宏观社会形势的评价	(12) 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13) 对社会秩序的预测

“社会交往的个人取向”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陌生人交往的意愿、信任度与行为取向，包括“对陌生人的信任”和“助人意愿”两个三级指标。人们在陌生情境中的心态和应对措施同样能反映出他们安全感水平的高低。

“社会治安状况的感受”指个人对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和心理感受，包含“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总体认识”、“公共场所的行为选择”和“夜间行走的限度”三方面。其中“公共场所的行为选择”指个人在公共场所中是否会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财物，防止被盗；“夜间行走的限度”指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敢于选择外出行走的可能性。显然，对社会治安持乐观评价的人社会安全感较之于其他群体更高。

“宏观社会形势的评价”指个人对社会现实和前景的评价及预期，包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对社会秩序的预测”两个三级指标。对政府工作满意度高、对社会秩序持乐观判断的人群，心态比较积极健康，其社会安全感也相应较高。

针对各项三级指标，笔者在问卷中分别转换成对应的问题来测量。问卷中共有 19 道题是对三级指标的描述。除了个别要求回答“是”或“否”的问题外，大部分问题的选项都设置成五个等级的形式。如三级指标“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评价”所对应的问题是“你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选项分别是“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较差”、“很差”。

为了准确地描述城市居民社会安全感水平，笔者采用德尔斐法（Delphi Technique）来确定五个维度（即本文提及的二级指标）的权重，即通过征询若干专家的意见，初步确定五个维度；再将专家们的意见匿名反馈给各个专家，让他们再次提出意见；然后根据专家组的较一致的意见，采用平均法确定五个维度的权重。在本次社会安全感指标体系的构建中，笔者共征询了 21 位精于定量研究的社会学学者的意见，其中包括 10 位教授、8 位副教授和 3

位讲师。最后得出的权重依次为：31.36：14.76：13.20：25.74：14.94。然后将各个维度的权重值平均分配到相应的三级指标内，从而计算出每名调查对象的分数（总分最高分为100，最低分为0），并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表2显示的是各项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所被赋予的分值：

表 2：指标赋值表

二级指标	1	2	3	4	5	总分
各项分值	0—31.36	0—14.76	0—13.20	0—25.74	0—14.94	0-100
三级指标	(1)—(4)	(5)—(6)	(7)—(8)	(9)—(11)	(12)—(13)	总分
各项分值	0—7.84	0—7.38	0—6.60	0—8.58	0—7.47	0-100

三、社会安全感指标体系的应用

为了检验本指标体系的设计是否科学有效，是否能较准确地测度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水平，以及是否有较好的效度，笔者选取了北京市、广东省东莞市、安徽省阜阳市三个城市进行调查。

1. 调查城市的背景资料

之所以选择以上三座城市，首先是因为这三座城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分别代表了变迁社会中的三种不同的城市类型。笔者以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划分城市类型标准：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一个特大型的综合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均相当高；东莞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沿海工业城市，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城市化水平相对于北京来说仍较低，快速城市化也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阜阳作为一个内陆城市，以国有和集体经济为主，多数企业陷入困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发展程度均较低。其次，北京是笔者就读学校所在地，东莞、阜阳是笔者的家乡，调查实施较为方便。表3描述的是三个城市的基本状况。

表 3：2001 年北京、东莞、阜阳市主要社会指标

城 市 变 量	北京	东莞	阜阳
总户籍人口（万人）	1122.3	153.89	179.72
非农业常住人口（万人）	632	40.37	36.21
非农人口比重（%）	56.31	26.23	20.15
流动人口（万人）	328.1	457.82	6.59
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4934（城八区）	2481	1001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2845.65	578.93	63.9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25523	37777	2269

从表3中可以明显看出：第一，从人口规模上说，北京完全是一个大都市，总户籍人口有1122.3万人，非农业人口也有632万人，流动人口是总人口的29.23%，城八区人口密度4934人/平方公里，这使得北京具有高密度、高异质性的特点，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居民心理承受能力较强，能够以逐渐成熟的积极的心态面对各种挑战和压力；东莞和阜阳的常住人口数量接近，但在流动人口方面，东莞有457.82万人，是其户籍人口的2.97倍，相比之下阜阳的流动人口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量的流动人口是影响社会治安状况及人们对其主观感受的重要因素。第二，从经济实力上说，北京和东莞人均GNP分别达25523元和37777元，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居民在经济上的抗风险能力较强；而阜阳属于较贫困的地

区,人均 GNP 仅为 2269 元,居民生活水平较低,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心态上也较为悲观。第三,从城市发展水平来说,北京、东莞、阜阳市的城市化水平^[10]依次为 56.31%、26.23%和 20.15%,东莞和阜阳不仅明显低于北京,甚至低于全国 30%左右的平均城市化水平。

综合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实力两方面的因素,笔者可以做出初步假设:北京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最高,东莞次之,阜阳最低。

2. 调查实施过程

笔者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在北京、东莞、阜阳市各抽取 100 个有效样本,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三市 18-65 岁的城市居民。在抽样过程中,笔者试图保证每个分析单位具有相同的被抽中的概率,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但由于时间、人力、物力等方面的限制,加上无法得到完整的抽样框,所以只能利用现有的资源,尤其是地图、熟知当地情况的人员以及介绍当地情况的资料,抽样、调查、数据录入三个步骤同时进行,使每个抽样单位具有近似的被抽中的概率。具体的抽样步骤和调查过程如下:

(1) 采用抽签法,从地图上显示具体街道名称的区或镇中,抽出 3 或 4 个作为调查的区域。其中北京和东莞的最新版地图中符合条件(居民均为非农业人口)的区/镇均有 8 个,分别抽取其中 4 个作为调查区域,北京抽中的是海淀区、东城区、宣武区和石景山区,东莞抽中的是市桥区、东城区、虎门镇和厚街镇,每区/镇各抽 25 户,合共 100 户;阜阳市区只有颍州、颍泉、颍东 3 区,直接进入下一阶段抽样。

(2) 在地图中把街道一级的区域单位名称(包括以街、围、屋、邨、花园、小区等命名的住宅区)标出并在其所属区域内排序、编号,然后依据随机数表抽出要调查的街道名称。北京和东莞每区抽 5 个;阜阳市的住宅区大部分都集中在其所属单位附近,而地图上显示的只有单位名称,因此阜阳该级抽样单位为带有家属区的单位,三区分别抽 6 个、7 个、7 个。

(3) 到达被抽中的街道(包括住宅小区)后,先观察所在街道的特点,如果分巷或座,先用随机数表抽出一条巷或一座楼;如果没有,则直接观察街内或楼内共有居民的户数,再利用随机数表抽出具体的要调查的 5 户。

(4) 在实地抽样中,若遇到特殊情况,我们会在随机抽样的原则下灵活处理。如街内既有独家独户的楼房,又有宿舍单元楼,即先估计总户数及各自所占的比例,然后按这个比例分配总共要抽的 5 个样本,再按第 3 步进行抽样;又如抽中的样本刚好是企事业单位,则放弃该样本而重新进行抽样。

(5) 入户后,对该家庭成员按照年龄(18-65 岁)先大后小、性别先男后女的次序排序,然后对照 Kish 选择表,选择访谈对象进行结构式访问。

(6) 由于调查与数据录入同时进行,因此在当天晚上发现无效问卷,第二天随即补抽与无效问卷数量相等的户数,以保证每个城市的有效问卷均为 100 份。事实上,我们在北京抽了 103 户,阜阳、东莞分别抽了 102 户,有效样本数均为 100 个,有效样本率分别为 97.08%、98.04%、98.04%。

3. 本指标体系的有效性检验

为了验证各级指标的有效性,笔者根据调查所得的数据,对 13 项三级指标进行分辨力^[11]计算,得到各项三级指标的分辨力系数依次为:2.30、1.87、2.88、2.35、0.89、2.31、1.55、1.26、2.09、2.29、3.58、2.74、1.69,最大值达 3.58,最小值也有 0.89,与三级指标被赋予的界于 6.60 与 8.58 之间的权重相比,各项三级指标分辨力均较高,即不同地区或

群体的人们在各项三级指标的得分比较分散，因而其效度也相应较高。

在这基础上，笔者再选择不同的因素，分别对五个二级指标进行方差分析。下表是以城市为因素，以各个二级指标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

表 4：以城市为因素，以各个二级指标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

二级指标	个人生活	个人风险	社会交往	社会治安	宏观形势	总分
F 值	7.343	1.902	1.516	13.779	5.068	11.197
Sig.	0.001	0.151	0.221	0.000	0.007	0.000

注：当 Sig.（显著水平） ≤ 0.05 时，该因变量就呈现显著差异。下同。

表 4 显示，在不同的城市中，居民对“个人生活状况的评价”、“社会治安状况的感受”、“宏观形势的评价”三项二级指标的显著水平均远低于 0.05，即均呈现显著差异，其区分度也较高；而各市居民在“个人风险的认知和评估”、“社会交往的个人取向”两方面的显著水平均超过 0.05，呈现的差异较小，但并不表明它们的效度就低。因为在以性别为因素，以社会交往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中， $F(1, 298)=6.323$, $Sig.=0.012$ ，在以收入状况为因素，以个人风险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中， $F(5, 294)=6.954$, $Sig.=0.000$ ，它们的显著性水平均较高，即不同性别、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分别在“个人风险的认知和评估”、“社会交往的个人取向”方面也呈现显著性的差异，所以这两项二级指标同样具有较高的效度。

总之，五个二级指标和 13 个三级指标的选择是较成功的，这奠定了笔者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

四、社会安全感调查结果的比较分析

1.调查城市公众社会安全感总体情况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三市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的总平均分为 48.28 分，不到满分的一半。其中北京居民的社会安全感平均分最高，达 52.30 分，东莞为 46.97 分，阜阳最低，为 45.56 分。这与前文提出的初步假设是一致的。各城市居民社会安全感得分的差异，主要是由该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决定的。同时，各项二级指标的总平均分都只是该项满分的一半左右，而被访者在“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感受”一项的平均得分更只是满分的 35.51%。这表明当今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是较低的，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表 5 描述的是三个城市的被访者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状况。

表 5：北京、东莞、阜阳市社会安全感的总体状况

维度 变量	个体生活	个人风险	社会交往	社会治安	宏观形势	平均分	标准差	样本数
北京	19.19	7.29	6.03	11.01	8.78	52.30	11.78	100
东莞	19.07	6.83	5.48	7.71	7.88	46.97	9.56	100
阜阳	17.02	6.59	5.76	8.70	7.49	45.56	10.39	100
全体	18.43	6.90	5.76	9.14	8.05	48.28	10.97	300
标准差	4.59	2.59	2.23	4.75	2.97	10.97	——	——
满分	31.36	14.76	13.20	25.74	14.94	100.00	——	——

在“个人生活状况的评价”方面，东莞与北京的得分相近，分别为 19.19 分和 19.07 分，阜阳则明显落后，仅为 17.02 分。居民的生活状况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经济收入、

公共设施状况、文化建设水平、环境污染程度等，但居民对个人生活的感受显然更多地受其经济收入的满意程度影响。与东莞和北京相比，阜阳作为该市经济支柱的国有及集体企业纷纷陷入困境，效益甚低，致使居民收入偏低，难以较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他们对个人生活评价较低是可以理解的。

在“个人风险的认知和评估”方面，北京、东莞、阜阳三市居民得分依次递减，但在前文指标体系效度的检验中已经证明，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应该说，对个人风险的抵御能力较低是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共同点。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城市居民普遍存在一种无把握感、无助感。尽管这是变迁社会中的必然，但它也要求我们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在“社会交往的个人取向”方面，北京居民的得分最高，阜阳次之，东莞略低。但与“个人风险的认知和评估”方面一样，三市居民之间的差异性较小。同理，这种社会交往中的不信任感也是剧烈社会变迁的产物。

在“社会治安状况的感受”方面，北京居民的得分高达 11.01 分，东莞和阜阳的得分分别是 7.71、8.70 分。但问卷中表征社会治安状况的题目显示：在被访者中，北京居民有 47% 受到过不同形式的侵害，东莞和阜阳的数据分别为 57% 和 33%^[12]。也就是说，社会治安状况最好的阜阳，其居民对社会治安的评价却远低于北京。笔者认为，这种矛盾并不是由于抽样误差引起的，而是有其深层的原因。从经济实力上讲，阜阳是三个城市中最弱的，其居民的收入较低，甚至面临下岗失业的危险。这在一方面表明，阜阳市居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最弱，居民惟恐失去哪怕价值并不太大的东西，从而放大了侵害对人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导致居民的心态较为悲观，从而影响了被调查者的主观判断。而北京的得分偏高，除了居民抗风险的能力较强、作为大都市的居民其心态比较积极外，还跟获取信息的途径有关。作为首都人，在特有的文化氛围下，北京居民更为关注社会的整体局势，且更容易从正规途径了解相关信息。笔者的调查表明，49% 北京居民通过电视了解当地的治安状况，东莞、阜阳分别只有 13%、28%；55% 北京居民通过报纸了解当地的治安状况，东莞和阜阳分别只有 24%、33%。而通过朋友同事、家人亲戚等非正式途径了解治安状况的，北京却远低于东莞和阜阳。相比之下，正规途径传播的信息更为客观、准确，并能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慌乱，特别是面对突发事件时的恐慌。北京和东莞的经济实力相近，但两市居民在此项指标上得分差距却有 3.30 分（42.8%），北京居民比东莞居民高。这主要应由两市的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来解释。北京的城市化水平较高，而东莞作为一个在短时间内迅速城市化的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流动人口大量涌入，而城市管理水平却相对落后，从而导致社会治安的恶化。

基于相似的原因，在“宏观形势的评价”方面，北京居民的得分也高于其他两市，显示出北京居民对社会前景更为乐观。

2. 不同人群社会安全感的比较分析

首先我们来考察人们的社会安全感与其经济收入、文化程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笔者把文化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四个层次，把月收入分为“500 元或以下”、“500—1000 元”、“1000—2000 元”、“2000—4000 元”、“4000 元以上”及“拒绝回答”六种类型，并将其作为定序数据（其中收入的“拒绝回答”归为缺失值），采用 Spearman 法对居民安全感总分与其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分别进行相关分析（如表 6 所示）。

在除去学生和拒绝回答者的 242 位被访者中，收入水平与安全感得分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pearman-rho 相关系数高达 0.532，远大于临界值 0.181，即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安全感越高。这是因为高收入人群的基本物质需求能较好的满足，使他们的安全

感获得一定的物质支持，进而使他们无论在对个人生活和个人风险的认知上，还是对社会交往、社会治安和宏观形势的评价上，均受到相应的影响。在收入水平与各项二级指标的相关分析中，Spearman-rho 相关系数依次为 0.657、0.264、0.231、0.202、0.298，显著水平均为 0.000，可见，高收入者在各项指标中均获得较高的分数，人们的收入水平确实全方位地影响着他们的主观感受。

表 6：居民收入、文化程度和总分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变量 2	相关系数 (Spearman-rho)	样本数 (n)	Sig .
收入	总分	0.532	242	0.000
文化程度	总分	0.336	300	0.000
文化程度	收入	0.371	242	0.000

注：当 $n-2=300$, $\alpha=1\%$ 时, 相关系数大于 0.148 为显著相关; 当 $n-2=200$, $\alpha=1\%$ 时, 相关系数大于 0.181 为显著相关; 在受访者中，除去没有收入的学生和拒绝回答者（共 58 人），此处的有效样本数为 242 个，有效率为 80.67%。

同样地，受访者的文化程度与其安全感得分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 0.336，居民文化程度越高，社会安全感越高。这是因为文化程度越高的人，掌握的信息量越大，看待问题越客观冷静；同时，由于人们的文化程度与收入水平也呈现高度相关，文化程度高的人其社会安全感有坚实的物质与精神的保障。

另外，笔者也对不同工作状况、不同职业的人群的社会安全感水平进行比较分析（见表 7）。

表7：不同工作状况人群社会安全感得分的分布状况

统计量 工作状况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失业或下岗	32	40.84	9.44	22.30	59.60
退休	47	44.13	9.37	22.64	65.08
学生	27	51.05	6.36	41.26	64.95
产业工人	27	44.45	10.13	23.65	66.05
商业服务工人	38	45.04	8.40	24.05	60.37
专业人员	60	52.28	10.04	34.04	71.14
管理人员	39	57.13	12.84	24.65	85.28
私营企业主	23	49.31	10.50	27.72	68.19
其他	7	44.75	14.36	31.09	69.58
合计	300	48.28	10.97	22.30	85.28

表 7 显示，在非在职的人群中，学生的社会安全感水平最高，达 51.05 分，退休者次之，失业或下岗人员的社会安全感在所有人中最低。在在职的人群中，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私营企业主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安全感水平，商业服务工人、产业工人的安全感则较低；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于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职业的分化，不同的职业往往表征了不同的社会地位。根据李春玲等人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划分^[13]，这五种职业的社会地位基本是依次下降的；而调查结果也表明以上五种职业群体的社会安全感得分是依次下降的。也就是说，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社会安全感水平，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安全感的得分就越高。王绍光等人曾提出了相对易损性（relative vulnerability）的观点。相对易

损性取决于潜在损失的绝对值在潜在受损者所拥有的总资源中占多大比重。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多，其“灾难线”越高，相对易损性越低，他越愿意冒险信任别人^[14]。笔者认为相对易损性的理论同样可以解释社会安全感的高低问题。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其所能占有或调动的资源越多，相对易损性越低。一个人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据的位置越高，占有的资源越多，相对易损性越低，社会安全感水平越高。反之，社会安全感水平则越低。此外分析还表明，人们的安全感并没有与他们在具体岗位上工作时间的长短、估计在该岗位上继续工作的时间长短呈现相关关系。

再者，参加社会保险以及购买商业保险的居民并不比其他的居民群体具有更高的社会安全感。设 x 表示是否参加保险，为虚拟变量， y 表示社会安全感的得分，得一元线形回归方程 $y = -3.645x + 49.189$ ， $\text{Sig.} = 0.012$ ，样本决定系数^[15] $r^2 = 0.021$ ，即总分中只有 2.1% 可以通过是否购买保险来解释。显然，是否参加保险与社会安全感的高低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保险多是居民所在单位为他们办理的，他们自己对社会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还有一些被访者要在笔者的提醒之下才意识到自己参加了社会保险。他们的心理并未因此有什么改变；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商业保险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各项服务还不太到位，即使是购买了商业保险的人，对自己是否能受到足够的帮助也缺乏信心。这两个因素导致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购买保险并不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水平的现实。

分析还发现，男性比女性拥有更高的安全感，平均值相差 5.75 分，而且男性的标准差为 11.88，大于女性的 9.01，说明男性群体内部异质性更高，这与男性扮演的社会角色更广泛有关，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五、总结和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社会安全感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设计了测度公众社会安全感的指标体系，并在调查中加以应用。调查结果表明，该指标体系是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的。

从整体来看，三市居民群体社会安全感的总平均分仅为 48.28 分，占满分的 48.28%，这表明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是较低的。从三个城市居民群体的社会安全感水平来看，北京、东莞、阜阳的平均分依次为：52.30、46.97 和 45.56。北京和东莞的差距主要是由社会治安水平的差异引起的，两地的经济实力均较强；阜阳的得分最低是因为其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较低。考虑到三市的市情，可以看出，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基本因素。一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应也较高，相对易损性较低，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社会安全感的得分就越高。北京和东莞就符合这一条件。同时，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是影响城市居民社会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城市管理水平较高，居民的心态也较为成熟，社会安全感就较高。这就决定了北京的社会安全感得分明显高于东莞和阜阳。从不同群体的社会安全感水平来看，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居于较高地位的阶层会比地位较低的阶层社会安全感高。在当代中国，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私营企业主要比商业服务工人、产业工人的社会安全感高，就是由于前者的社会地位高于后者。当前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主要有：经济收入、文化程度与职业。而职业往往是经济收入与文化程度的综合体现。一般来说，地位越高的群体，其占有的资源越丰富，相对易损性越低，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社会安全感的得分就越高。

从调查的结果看，本指标体系的设计是比较科学的。首先，本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广泛征求了相关专家意见的结果，能够准确地描述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状况；各级指标的区分度亦较强，能够有效地反映不同社会成员的安全感水平，从而使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其次，三个调查城市的居民社会安全感水平和笔者基于三市基本情况的经验判断是一致的，这表明了本指标体系的有效性。第三，运用本指标体系测量的三市的社会安全感状况可

以由相对易损性理论和有关社会分层的论述解释，这也表明本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指标体系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指标选择具有多样性，在很多情况下，一个用指标操作化了的定义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概念，这是定量研究有时受到攻击的原因之一，也是笔者在本次社会安全感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再加上社会的持续变迁，使各指标必须在实践研究中进行不断的增删，体现各指标的问卷问题也需要不断的修改。第二，各项指标赋予的权重是专家评判的结果，虽然这种判断建立在专家们的经验基础上，但这种主观构权法依赖的毕竟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权数分配的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缩小这种误差成为我们在改进指标体系中的另一重要工作。第三，本次调查只在北京、东莞、阜阳三市进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笔者构建的指标体系的有效性，但由于应用范围的局限，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其适用范围和程度，也难以准确确定社会安全感的“低”、“中”、“高”的分值范围。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有必要依照该指标体系对更广泛的地区进行调查分析，尤其是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并根据调查结果重新调整该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 Abraham · H · Maslow, 1999,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P35-47.

[2]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编. 你感觉安全吗? ——公众安全感基本理论及调查方法[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1. 20-22.

[3]参见中青网, 2000-12-12, <http://xinli.cycnet.com>.

[4]杨奇. 群众安全感浅析[J]. 北京: 公安研究 1989(1). 58-61.

[5]时蓉华主编. 社会心理学词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134.

[6]朱智贤主编. 心理学大词典[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7.

[7]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编. 你感觉安全吗? ——公众安全感基本理论及调查方法[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1. 20-22.

[8]江绍伦. 安全感的建造[M]. 香港: 岭南学院, 1992. 2.

[9]张春兴, 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465.

[10]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国内外目前最为通用的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指标(参见邓拓芬,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定量分析及预测 [J]. 上海统计 2001(6). 14-16).

[11]分辨力的计算方法是: 先对样本总体的总分进行排序; 然后取出总分最高的 25% 的人和总分最低的 25% 的人, 计算这两部分人在每项指标中的平均分; 再将两个平均分相减, 所得的就是该项指标的分辨力系数(参见袁方,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01-302)。

[12]有研究者提出: 表征社会治安状况的指标应包括“每万人的警察数”、“每万人犯罪案件发生数”、“每万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每万人火灾发生数”等四个方面(参见朱庆芳、莫家豪、麦法新, 世界大城市社会指标比较[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7: 87-90)。然而笔者所能获得的数据仅包括各市查处治安案件的数量、刑事案件的立案数或破案数, 不但无法满足上面的条件, 也难以进行城市间的比较。笔者认为, 通过询问调查对象“是否受过侵害”, 再对各城市中受过侵害的人数进行比较, 倒可以较准确地描述该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 特别是能看出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

[13]李春玲等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十个社会阶层构成,从上至下依次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李春玲、陈光金,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R]. 2002: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15-122)。

[14]王绍光、刘欣: 信任的基础: 一种理性的解释[J]. 社会学研究 2002 (3). 23-39.

Measur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ense in Transitional Society ——An Analysis Based upon the Investigation in the Three Cities of Beijing, Dong-guan, and Fu-yang

Li Xue¹, Wan Hui-yi²

(1.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ocial security sense is the public's subjective feeling and evalu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ituation--their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reaction to the degree to which their legal rights of personal safety and property are / will probably be encroached on / protected in certain period of daily life. It indicates the public's recogni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tatus and their confidence in soci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is definition, the author has constructed the indicator system for measuring social safety sens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in Beijing, Dong-guan, Fu-yang. The analysis based upon 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is system can effectively and accurately reflect the social security levels in the above-mentioned cities, with a high validity. Our conclusion i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re very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nse of social security level in an area, that the higher social status of certain group, the greater their ability to avoid risks, and that the less the relative damageability, the higher one's sense of social security level.

Key words: sense of social security; indicator system; Delphi Technique; social status; relative damageability

收稿日期: 2003-09-21;

作者简介: 李雪、万惠仪,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